

太阳的
孩子

重新发现中国文丛

太阳的朗照

梁启超国民性研究文选

梁启超·著
摩罗 杨帆·编选
杨帆·标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的朗照:梁启超国民性研究文选/梁启超著;摩罗,杨帆编选.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

(重新发现中国文丛)

ISBN 978-7-309-07609-7

I. 太… II. ①梁…②摩…③杨… III. 民族性-研究-中国-文集 IV. C95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7100号

太阳的朗照:梁启超国民性研究文选

梁启超 著 摩罗 杨帆 编选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关春巧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 字数 308 千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7609-7/C·167

定价:3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根据中国 走向世界

——“重新发现中国文丛”序

邓正来*

晚近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诸如“西方的终结”、“中国拯救资本主义”、“中国统治世界”这样的话语充斥着中国社会科学界。在这种学术风尚盛行之前,我主要经由三个方面的学术努力从理论上论证中国社会科学实现“知识转型”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第一,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来看,“全球化问题”并不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也是一个话语的问题,是何种视角将支配我们审视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我经由细致研究后认为,我们在被卷入一种所谓客观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介入了一场有关全球化的“话语争斗”之中,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其核心就是话语争夺权的问题。而这场话语争斗的关键意义便在于它向我们开放出了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即我们究竟面对的是谁的全球化?何种“全球化”?这不仅要求我们强调有关全球化的“问题意识”,更是要求我们强调一种由全球性与全球主义高度互动构成的全球化进程。这种要求所依凭的乃是乌尔利希·贝克在全球化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这样一种颇为著名的概念分析框架:广义的全球化既不只是一种客观现实,也不只是一种主观建构,而更是一种主客观的互动进程,而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便是被分别称为全球性、全球主义和全球化的三

* 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编,《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

个概念^①。显然,这一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它给我们开放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维度,亦即我前面提到的关于全球化的话语争斗维度。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对那种片面强调全球性或全球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在面对各种因素繁复互动的问题的时候总是很随意或者很习惯地把它们描述成一个极其片面的平面图像?因此,将全球化问题本身做“问题化”处理的努力,不仅意味着我们意识到全球性和全球主义是一起出场的,而且还意味着我们绝不应当简单地以为全球化是一种孤立存在的客观现象,而应当充分意识到全球主义对全球性的建构或形塑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当介入到有关全球化之性质的“话语争斗”中,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而其核心问题便是有关何谓“全球化”或“全球化”何去何从的话语争夺权的问题。质言之,全球化就其性质而言其实是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②。

第二,当下中国所进入的“世界结构”对中国构成了基于“承诺”的支配,这种支配性质的变化其实为中国和中国社会科学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我看来,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加入世界结构之后,世界结构支配的实效所依凭的却是被纳入这场“世界游戏”的中国对其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的承认。换言之,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是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并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守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而不论中国是否与之进行“共谋”。这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为中国带来挑战的同时,事实上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即给我们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规则的资格。但我们能否将这种资格转化为现实的修改规则的能力,其前提乃在于:作为“思想库”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关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理想图景”;否则,我们所获得的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如果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种全球化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全球化等方面的理想图景,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的方面作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只能要么拥抱西

① 参见 U. Beck, *What is Globalization?* London: Polity Press, 2000, 转引自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载《欧洲》2000年第1期。

② 参见拙著:《谁之全球化? 何种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四章。

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作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①。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个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进入了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第三,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知识实是一种以权力和“正当性赋予”为基本实质的话语。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了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②。此前,正是因我们对潜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新自由主义话语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中国社会科学所形成的全球化话语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秩序在根本上乃是以“西方理想图景”为依归的。因此,只要我们洞见到社会科学知识所具有的这种“正当性赋予”力量并恢复其批判性品格,我们同样能够以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为灵感之源、以基于中国视角对“世界理想图景”的想象为理论依据而建构我们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社会科学理论,进而推动这种理论走向世界。

正是主要以上述理论洞见为基础,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我所谓的“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种“知识转型”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同时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在我看来,这是全球化时代所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我们究竟拿什么样的成果走向世界呢?我个人一直坚持这样的一种观点:毛泽东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不仅可以适用于中国文学艺术事业,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科学。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

① 参见拙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23页。

② 同上书,第266—267页。

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不可能用“西方化”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这个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西方化”的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二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国文化为支撑的,因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然是“地方性”的。这就需要中国的学者用一种“地方性”的社会科学来解释和回答中国和世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据此,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一是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让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三是以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秩序重构的理论建构走向世界。在我看来,这三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的烙印,也是我们可以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的地方,更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重新发现的重中之重。

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重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要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发掘中国和中国人所具有的“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和思想资源;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毋宁是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的文明体;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中国”亦不是排他性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当下中国”,而毋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创办了这套“重新发现中国文丛”。我们期望:它既成为中国学术丛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亦能成为新时期最著名的“中国研究”大型文丛;既能成为我们将世界著名中国研究成果“引进来”的一个学术渠道,亦能成为推动以中国深度研究为特色的学术成果“走出去”的一个学术平台!

解 题

近代以来,对国民性问题进行过最多研究的是梁启超和鲁迅,这两人都是在西方殖民背景下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寻找起死回生之路的一代巨人。

但是,他们的言说角度、文字风格所形成的精神形象具有明显的区别。梁启超在毁灭性的灾难面前,具有博大恢宏的气度和不可战胜的自信,充分体现了太阳普照天下、滋润万物的温暖光明特征。他对于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都充满了起死回生、凤凰涅槃的信心。

与梁启超相对应的是鲁迅。

梁启超是中国的太阳,鲁迅是中国的月亮。

解题

第一辑 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政治 /001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 /003

中国积弱溯源论 /008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031

爱国论 /035

第二辑 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文化精神 /045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节选) /047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056

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 /063

第三辑 中国国民性与中国地理 /067

中国地理大势论 /069

地理与文明之关系 /086

第四辑 中国国民性之自觉 /095

灭国新法论 /097

呵旁观者文 / 109

论中国国民之品格 /114

中国国民之缺点 /118
中国道德之大原 /123
国性篇 /131
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 /134
伤心之言 /136
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 /141
论中国之将强 /145
论中国人种之将来 /150
组织能力及法治精神 /156
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 /158

第五辑 中国国民性综合研究/ 161

释革 /163
服从释义 /167
敬告我国国民 /174
少年中国说 /178
新民说 /182
后记 /302

第一辑 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政治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

宇内文明之流域，发源亚洲，而中国其最著也。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然取两域数千年之历史比较而观之，可以见其异同之故与变迁之迹。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现状之所由来；寻其影响，可以知将来形势之所必至。故刺取而论之，以备审时论世之君子省览焉。

第一章 其相同之点

一、家族时代与酋长时代

穹古之史，虽不可尽信，然推原人类之所由起，与邦国之所由成立，无东无西，其揆一也。人类孳生之始，无舟车交通之便。一山之阻，一河之隔，遂划然分为各个之小团体。故老子曰：“古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其民老死不相往来。”盖其时皆以种族分国，种族无限，其国亦无限。董子所谓九皇六十四氏者，皆以家族为国者也。

其后稍稍蚕食，强有力者出而威服异种，合并而隶于己国，是为酋长时代。当时之战争，弱肉强食，皆因种族之分别而起。其第一期最有力者，则共工氏霸有九州，次有蚩尤氏与轩辕战于阪泉之野。其第二期民众而悍者，则有苗氏皆土著之民。其第三期则黄帝之子孙，入冀豫之地而夺之，卒迁三苗，享有其地。后此所谓三代者，皆轩辕（即黄帝）之后也。凡此种族之竞争，一如亚利杨族瑟迷节族哈米节族等之相争，而后来者恒占胜利焉。此其进行之轨度，与欧洲毫无所异。夏殷之间，虽云帝政，其实则各各种族之酋长，相与并立。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皆酋长也。夏殷不过诸酋长之盟主耳，然当时千年中有势力于禹域者，不独夏殷两氏。如有穷氏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皆尝代夏殷而为盟主者。大率如西方之埃及、巴比伦、亚述利亚、波斯各国，递相雄长，而皆具一大国之形，与小种族之相侵噬者有别。

二、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

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彼此皆列国并立，其所以立国之来由虽异，而其立国之要素，逐渐完备，文明逐渐发达，则无异。周之一代，纯为贵族政治。在周则有周召单刘，在齐则有国高，在鲁则有三桓，在郑则有七穆，在晋则有栾郤胥原范荀，在楚则有昭屈景，皆相继持一国之大权。欧洲人所谓少数共和政体，谓之寡人政体者是也。其政府（即贵族）之权力甚重，过于国君。国君之废立，出于其手。国君之行为，能掣其肘。如周厉王无道，国人流之于彘。而共和执政，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之类是也。以希腊诸国比例之，大约近于斯巴达之政体最多。其国权上不在君，下不在民，而在国中之一部。此一部之权，实有伟大可惊者。虽然，其于平民也甚相亲，故其民亦与国同体。国之大事，时或得参末议焉。（例之如鲁长勺之战，曹沫以匹夫而见鲁侯参军事。郑商人弦高以乘韦之牛却秦师。晋韩起求环于郑贾，郑之执政者辞之，述政府与贾人所订盟约为词，是政府与商民，有时亦立于平等地位也。此外尚多不备述。）故当时为贵族政治时代，亦为民权稍伸时代。

列国并立无所统一（当时周室亦仅在于列国地位，无统一之势力），故常有盟主以联合之。晋楚争霸，狎主夏盟，略如阿善与斯巴达同立于希腊世界之中心，迭为雄长。而其结局也，因并立竞争，不得不鼓励人才，扩张国势，于是予人民以言论思想之自由。故哲学文学，极盛于时，为此后世界开无限之智慧，辟无限之境界，皆因国势而造出时势者也。此其最相同者也。

自春秋战国以后，而有秦始皇之暴兴，旋继以两汉之统一，而中国小康。自希腊以后，而有亚力山大王之骤起，继以罗马之统一，而欧洲小康。自其形体上观之，固甚相类。若其实际，则有大相异者。请于次章详言之。

第二章 其相异之点及其原因与影响

一、欧洲自罗马以后仍为列国，中国自两汉以后永为一统

中国与欧洲之国体，自春秋以前（欧洲史家所称上世史时期），大略相同。自春秋以后，截然相异。其证据甚多，而最重要者有二端。其第一端即此节所论是也。

自酋长竞争,以至于列国竞争,此乃世界人类自然之程度而不可避者也。其局至今未息,而日益剧烈。不独欧洲为然,即以亚洲论之,五十年前之印度,三十年前之日本,皆一国中含有无数小国。而欧洲上下数千年,除罗马时代外,无一日不在并立竞争之中。独中国则不然,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中间如汉时封子弟为王,功臣为侯,晋时之八王,明代之燕王宸濠等,虽有封建之举,不移时而遂变灭,不成其列国之形也。汉末之州牧,唐代之藩镇,各拥疆土,私子孙,虽气焰万丈,不过涌乱一时,不成其为列国之形也。中间如三国时代,如南北朝时代,如宋与辽金时代,颇成并立之世,然相敌者不过一二国。竞争不烈,且历时未久,辄复合并。其影响及于古今全局者,盖不甚大。若晋之十六国,唐季之十国,更不足道也。故中国自秦汉至今日,可直谓为统一时代。是为中国国体与欧洲大异之一事。此种异点,其原因何自乎?凡各国之裂土而治者,大率因于宗教与种族之不同。德意志各国所以能为联邦者,种教相合也。希腊塞尔维亚诸国所以裂土耳其者,种教不相合也。中国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而宗教遂定于一。虽有佛教流入,而出世间法,不与世间事。故中国全境,可谓之同奉一教。若欧洲则既有耶教回教之分,耶教之中,复有希腊耶稣天主之别。此其所以异者一也。若其种族之合并,颇难寻其踪迹。夫夏殷以前,群族相竞,迄于有周。除中原之地,所分封功臣子弟以外,自余若秦楚吴越,当时目为夷狄,皆与中原异族者也。而西戎莱戎陆浑戎羌戎淮夷赤狄白狄长狄等,各各种族,杂处于内地,春秋时尚班班可考也。何以自汉以后,种族之界忽灭?凡在神州禹域者,人人皆有同胞之观。此其变迁之速,最不可解者也。推原其故,盖当时男女同姓其生不繁之学理,已大行于世。各国君主与贵族,皆娶于异姓(即异种)之国,而民间效之。故春秋战国以后,其各族之人民,早已互通婚姻,渐渐无差别之可言。故国地一经合并,国民遂为一体也。而欧洲各国,其种族皆迭起错出,风俗不同,婚姻不通。此其所以异者二也。坐此二端,故欧洲诸国常分立,而中国全域常统一之所由也。然则其影响何如?凡列国并立者必相争,使天下无罪之民,肝脑涂地。又凡封建贵族之国,持国权者必极骄倨,奴视其民,民不堪命。故论安民之政,则列国必不如一统,斯固然也。虽然,列国并立者,以有所争竞,故其政府不能不励精图治,以谋国家之进步,求足与他国相角,而不至堕落,如是则国政必修。其国民常与他国相遇,常与战事相习,则其敌忾好胜之心,自不得不生,如是则民气必强。国政修,民气强,而国民之文明幸福,遂随之而日进。此列国并立之效用也。

若我中国以数十代一统之故，其执政者枵然自大，冥然罔觉，不复知有世界大局，惟弥缝苟且以偷一日之安，务压制其民，以防乱萌，而国政之败坏萎弱，遂至不可收拾。其国民受压既久，消磨其敌忾之心，荡尽其独立不羁之气，以至养成不痛不痒今日之天下。此则二千年一统之国势所影响也。

二、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

欧洲自今世纪以来，学理大昌，天赋人权平等同胞之声，遍满全洲，于是分国民为数等阶级之风渐息矣。而昔者则数千年来，万方同慨，虽以亚里士多德之高识，犹谓奴隶之制为天然公理。以希腊罗马之文明，而其下级社会之民，被虐待者惨无天日。其所谓沐文明之膏泽者，不过国中少数一部之人耳。至如合众国当十九世纪之时代，尚至为争买奴而兴干戈。法国既为共和政体，而贵族之权犹不替。推之亚洲各国，印度分人为四等之俗，至今未改。日本非人、秽多等称号，至维新后而始除。然则阶级之风，殆亦可称万国之公俗矣。独我中国则历古以来，此风不盛。自汉以后，尤绝无之。卜式以牧羊为郎，公孙弘以白衣为丞相，自此以后，布衣卿相之局，司空见惯矣。但使有才能，中资格，则无论出何门第，执何职业，皆可以执政权为民上。虽中间晋代立九品中正取士之制，其积弊所倾，当时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之评判，然非其立法之本意也。且行之不久，遂亦废辍。自唐以降，设科取士，平地青云，更无论矣。两汉屡下诏免奴婢。近世虽有“皂隶奴才，不许登仕版”之禁，然其数甚微，不能目为一种阶级。故中国可谓之无贵族之国，其民可谓之无阶级之民。是又为中国国体与欧洲大异之一事。

此种异点，其原因何自乎？中国当战国之时，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发达人材，扩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邹衍淳于髡苏秦张仪之流，皆抵掌横议，以取卿相，贵族世卿之藩篱既已决破矣。而当世圣哲孔子墨子之徒，大倡平等之义，孔讥世卿，墨明尚贤，其门弟子多出身微贱，名闻一时（子张狙佞也，颜涿聚大盗也，学于孔子。禽滑厘大盗也，学于墨子）。故天下相与化之。以视亚里士多德之主张蓄奴者，大有异矣。汉高祖既起草泽作天子，其左右股肱萧曹韩彭之流，皆起家贱吏，牙侩屠狗，致身通显，君臣皆如是。故能举自有人类以来天然阶级之陋习，一扫而空之，殆非偶然也。欧洲则贵族常智而强，贱民常愚而弱，故数千年不能破此关，亦有由也。

此事之影响又何如？无阶级之国民，一般享受幸福，固为文明进化之一征验矣。虽然，进化者以竞争而得，竞争者以激搏而生。欧洲惟分民为阶级，小数之贵族，对于多数之平民，其惨待不以人理，故官民相争之局屡起。民气日昌，民智日开，遂能打破积弊，一跃而登于太平仁寿之域。若我中国人，则非受直接之暴虐，而常受间接之压制。人人天赋之权，虽未尝尽失，而常不完全，被民贼暗中侵夺，而不自知。故怨毒不深，而其争自存也不力。又被治之人，俄然而可以为治人之人，故桀骜愤激之徒，往往降心变节，工容媚，就绳墨，以求富贵。故民气不聚，而民心不奋，宋太祖所谓“天下英雄在吾彀中矣”。此中国历代君相愚民之术，巧于欧人者也。呜呼！我中国国民权之难兴，即坐是故。可悲乎！

第三章 结 论

中国与欧洲国体上相异之点虽不一，就余观之，则莫如此两者为最，而其一切相异之点，皆可以归纳于此两者之中矣。夫以文明之公例论之，列国并争，比于合邦统一，则合邦统一者为优。有阶级之民，比于无阶级之民，则无阶级者为优。此天下之所共认也。然则我中国之进化，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而今日欧洲之文明，与我相比，不啻霄壤。此其故何哉？自春秋以前（西史上世纪），我与欧洲事事相去不远。自汉以后，我骤进而欧人如旧。自今世纪以来，欧人骤进，而我如旧。二千年所积进化之资格，每下愈况，此其故何哉？吾今更有言一，欧洲自希腊罗马以来，即有民选代议之政体，而我中国绝无闻焉。此又其最异之点而绝奇之事也。中国之无此政体何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也。民何以不求自伸其权？不见他人之有权，故不求也，因一统闭关之故也；不知己之失权，故不求也，因无阶级自安之故也。故吾仍以归纳之于前两者之异点也。呜呼！夫孰知学理上之文明，乃适以阻实上文明之进步乎？吾则曰：“非阻也，未有能善用之者也。”嗟乎！往者不可追矣。今日地球缩小，我中国与天下万国为比邻，数千年之统一，俄变为并立矣。经济世界之竞争，月异而岁不同。今者以中国为众射之的，此后社会上之变动，将有不可思议者。数千年之无阶级，俄变为有阶级矣。二千年之停滞，既不可以得进步，今日当于退步求进步，或者我中国犹有突飞之日乎？

选自《饮冰室合集》(1)，中华书局 1989 年版